

普罗米修斯的辩证法神话研究*

李包靖

【提要】西方19世纪时代精神的自我理解主要建立在泰坦英雄普罗米修斯形象上。从谢林、海涅和马克思三大家的普罗米修斯神话研究中可以归纳出一种辩证法神话研究路径。谢林“反神圣成为神圣”的辩证法造成了时代主体普罗米修斯造物个体市民和赫拉克勒斯审美创造天才的二元精神分裂。海涅通过诗学的反讽——辩证法的反题研究，揭示启蒙运动流产的内在原因：作为个体审美创造者的启蒙者反被市民个体被启蒙者所伤。布鲁门贝格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需要辩证法的审查，揭示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压迫和束缚人性的忧郁事实。我们应该通过劳动来发展集体性神圣价值的学说，批判和扬弃资本私人人性。

【关键词】普罗米修斯神话 布鲁门贝格 辩证法 神话研究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7)02-0077-09

布鲁门贝格的《神话研究》把西方文化中关于古今普罗米修斯神话研究的史料、故事和轶闻完整归纳，并与西方人性思想的变迁史连接起来，既高屋建瓴地重构波澜壮阔的西方审美思想史，又别开生面地刻画时代精神隐秘的流动轨迹。西方19世纪辩证法大盛，被形而上学压抑已久的它走进了普罗米修斯神话研究。这一神话研究足以说明辩证法在西方审美思想史上的独特地位和文化功能。西方19世纪普罗米修斯辩证法神话研究不是一种理论建构活动，因为它在“认识、精神文化、在一定程度还有物质现实的最一般的发展规律”^①方面建立其神话研究的整体情境，而这又恰好是辩证法理论建构活动的场域。因此，本文以谢林、海涅和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神话研究为个案，归纳出辩证法的神话意蕴，反思浪漫主义审美意识的悖谬性，批判资本主义积累规律束缚人性的事实根源。

一、对浪漫派的辩证法神话研究

在自我发现的历史基础上，西方19世纪欧洲时代精神的自我理解建立起普罗米修斯的泰坦英雄形象。在之前的普罗米修斯神话研究中，如果说狂飙突进时代歌德的神话研究指涉诗人艺术创造的诸神形象，那么，从时代精神来看，此时期的普罗米修斯已从诸神降格为英雄。在拜伦史诗《恰尔德·哈罗德游记》第三章中，布鲁门贝格敏锐地感觉到“泰坦英雄的神义论不是他所遭受的苦难，而是上帝可能呈现为人的血肉之躯这一事实”。^②无论是诗中的角色无名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布鲁门贝格的诗学与解释学研究”(09YJC751067)的阶段性成果。

① [苏]捷·伊·奥伊则尔曼主编：《辩证法史：德国古典哲学》，徐若木、冯文光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② Hans Blumenberg, *Arbeit am Mytho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1, S. 609.

行者还是作者拜伦都禀有上帝化身为人的形象，从神义论降格为人义论。这个时代的普罗米修斯神话研究所呈现出来的变形、修正和文体变革等征候，无不显示出此神话主题所筹划的思想位置已经空缺，新的时代精神可能会以种种不同的方式再度占据传统空缺出来的思想位置。

众所周知，启蒙时代大行其道的历史哲学非进步论莫属。凭借普罗米修斯神话研究情境，西方19世纪时代精神认识到“进步终究没有改变时刻准备推动历史进步的个体境遇”。^① 进步论终究是一纸空文！因为该普罗米修斯神话研究的结构关系发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普罗米修斯“被束缚在岩石上的痛苦”转移到“兀鹰啄食心肝的痛苦”。狄德罗曾根据自身的时代体验说过，普罗米修斯之类的人太多了，同样啄食他们心肝的兀鹰也太多了。^② 众多的兀鹰啄食众多心肝的事实无疑表明，人们正遭受贪婪欲望的折磨。受进步论瘟疫感染的“历史让人类受难”，莫非与此事相关？折磨着普罗米修斯的兀鹰代表着生存恐惧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怀疑意识，它们驱使西方19世纪的普罗米修斯们进行神话研究。为了反抗作为实在的自然所带来的恐惧，普罗米修斯们在启蒙运动的进步论精神的照耀下，万众一心征服自然。令狄德罗始料未及的是，普罗米修斯们今天盖起比洞穴更为舒适的小屋，明天又渴望住进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显而易见，人性的贪婪与启蒙的进步论脱不开关系。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维护文明的界限，否则我们超越文明界限的那天，即是文明崩溃之日。

“观念的瘟疫”在西方19世纪浪漫主义和观念论那里的历史剧情颇为吊诡。浪漫主义者竟然视而不见普罗米修斯神话研究中主角的盗火行径？布鲁门贝格遂以F.施莱格尔、A.施莱格尔和谢林为例，揭示了普罗米修斯神话研究情境从诸神形象逐步过渡到后泰坦英雄角色的现代性变形过程。

滥觞于观念论的天才口号在浪漫主义理论中成为分贝最高的尖叫内容。F.施莱格尔一再将“人神类似原则”的历史哲学称为“合法的世界观”，随之而来的哲学行动依然承担着启蒙

运动重任——以理性摧毁传统的同一性。理性赶走了传统的君主之后，会不会自己加冕为另一个君主？在康德等人的观念论中理性是设限的，理性之光有更高的光源，故有先验论之说。浪漫主义者总觉得先验论对主体来说是一个“绊马索”，欲除之而后快。这种思想行动反映在普罗米修斯神话研究的情境中，就是把理性之光作为潘多拉的嫁妆赠予人类。施莱格尔等人于是把先验论的天才口号巧妙地调包为天赋理性之说。利用先在的时间上的共同特点，把先验说成天赋，即把普罗米修斯的盗火行径洗白了。同样是占有他人的财物，盗窃总不如陪嫁显得理直气壮和光明正大。浪漫主义以启蒙理性摧毁传统的同一性为己任的行为简直是无法无天。先验论的天才世所罕匹，浪漫主义天赋理性即是天才，那么天才就不是孤独的个人，而是一伙到处叫嚣的人群。浪漫主义正式登上哲学史舞台。

在观念论主体哲学转为浪漫主义内在论的过程中，布鲁门贝格洞悉大小施莱格尔兄弟肩负着进行普罗米修斯神话研究的重任：“让人类‘适应’后泰坦王朝时代。”^③ 此话的隐喻意义无疑指出，西方19世纪普罗米修斯以泰坦作为概念图式，建构自身角色，区别于上个世纪下半叶的诸神形象。这是一种新型的内在体验和自我意识。后泰坦时代的普罗米修斯就是浪漫派审美创造的天才。“根据康德先验演绎的推论，主体创造活动必须将必要条件的创造同一种审美的自由筹划条件结合起来”，^④ 但是，浪漫主义的主体自由审美创造活动却把创造的必要条件一脚踢开。如果这种主体创造活动是完全自由的，那么，浪漫主义的自我意识必定是神秘难解的，其原因在于“独特意志”造成孩子气

① Hans Blumenberg, *Arbeit am Mytho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1, S. 610.

② Hans Blumenberg, *Arbeit am Mytho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1, S. 609.

③ Hans Blumenberg, *Arbeit am Mytho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1, S. 623.

④ Hans Blumenberg, *Arbeit am Mytho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1, S. 623.

的反复无常。这种现象可以从两个方面予以说明：第一，如果说自由是一切意志行为的共同要素，“意志的意志”简直等同于“自由的自由”，自由显然被滥用；第二，只有当某物可能同自我意欲相矛盾时，我们才有可能意欲（意志）这个某物，“意志的意志”只能是对于自我的意欲。1842年至1845年间，谢林在柏林的“神话哲学”讲演，树立起了普罗米修斯的历史哲学的形象。“意志的意志”在认识论上一把扯掉绝对哲学的面纱，露出普罗米修斯由诸神形象走向后泰坦时代新型主体的真面目。

谢林的“意志的意志”思想来自于亚里士多德的“积极理智（*nus poietikos*）”学说。“积极理智”通过人高贵的认识活动由天上降落人间，并自外而内进入了人的思想。按照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上帝是神圣的，上帝赠予人的礼物“积极理智”也是神圣的，由此推导出，人稟有“积极的理智”就是稟有神圣。但是，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得出人是上帝的结论。“积极理智”具有神圣的必要条件，但缺失充分条件，换成哲学用语可表达为：“积极理智的整体仅仅代表了它的个别主体确立普遍有效真理的一项功能性必要条件。”^①浪漫主义大都是狂热分子，在审美自由创造中喜欢用内在论瞬间体验的“理智直觉”灵感说取代三段论与充分和必要条件的演绎推理。

且看谢林是如何运用“正反矛盾一体化”的技巧使他的自由意志具有神圣性的。“例如这个命题：完善的是不完善的，那它所能确立的含义就是：不完善的东西不是通过它于其中是不完善的东西存在，而是通过在它之中存在着的完善的东西存在；但对于我们的时代它就具有这种含义：完善的和不完善的都是一样的，一切都自身等同，最坏的和最好的，愚笨和聪明都一个样。”^②这段话演示了其“正反矛盾一体化”的辩证法。谢林接下来需要处理伦理世界与自然世界的同一问题，“或者假如在另一个将必然的东西和自由的东西解释为同一的习语中，其意义是：作为伦理世界之本质的这个东西（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也就是自然世界的本质”。^③自然世界和伦理世界的同一不是对立

统一的辩证关系，而是判断中系词的更高运用，它为自然界（人）过渡到伦理世界（神）开辟了渠道。把上述的两段引文综合起来，我们就可以大致得出谢林式辩证法：事物的正反矛盾构成事物的本质，正即是反，反亦是正。理智虽说不是上帝，但理智若要具有神圣，无需逻辑上跳跃，只要对抗上帝就可跻身神圣行列。“反神圣也就可以把自我置于上帝的位置”，^④因为反神圣亦是神圣的。反抗宙斯的普罗米修斯的英雄品格不复当年诸神之争的审美价值，而谢林通过正反对立的辩证法使天赋理性的人性跃居为神圣之列。他的对立统一关系只有系词上的同一，而没有辩证统一。正反矛盾一体化的对抗性已初露斗争哲学的端倪。

倘若把正反对立的意志哲学转为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则需继续发挥黑格尔的正题、反题和合题的辩证思想。因此，谢林的普罗米修斯神话研究需要从两个方面克服其历史哲学的内在困境。一方面，按人神类似的浪漫主义原则，宙斯（正题）和普罗米修斯（反题）的诸神之争维持着世界的平衡。但是，正反对立的斗争只会使历史陷入无休止的循环。谢林的绝对同一哲学并没有走向黑格尔辩证哲学对立统一的合题。另一方面，正题和反题经过辩证法扬弃后所形成的合题说明，浪漫主义的“历史维度不具有偶然性，而执行了一种内在目的论”。^⑤谢林不想让他的意志哲学仅是一种无意义的循环，因此在“神向世界的合理过渡”中，“不得求助于‘启示’”。^⑥他的神话研究结果只能是对历史哲学的反讽。天神宙斯和人间女子所生的赫拉克勒斯恰好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只有他才能解放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这种神性和人

① Hans Blumenberg, *Arbeit am Mytho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1, S. 625.

② [德] F. W. J. 谢林：《对人类自由的本质及其相关对象的哲学研究》，邓安庆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53页。

③ 《对人类自由的本质及其相关对象的哲学研究》，第53页。

④ Hans Blumenberg, *Arbeit am Mytho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1, S. 625.

⑤ Hans Blumenberg, *Arbeit am Mytho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1, S. 630.

⑥ 《辩证法史：德国古典哲学》，第212页。

性的合题已经成为辩证法的终末论启示，而非历史上的合题，显然有违历史辩证法逻辑。

谢林的神话研究为什么会出现上述逻辑难题和现实困境？首先，我们应该从谢林的普罗米修斯神话研究的辩证法语境来观察后泰坦人性。顾名思义，后泰坦人性来自于泰坦时代。“宙斯本人是敌对人类的原则”，^①后泰坦人性通过反神圣而成为神圣的方式，跃居神圣之列，与宙斯的神性构成对抗。“神圣”的后泰坦人性具体何指？谢林曾褒扬光辉的泰坦人性，“意识思维的发生神秘起源在于创造与灵感之间”，^②这曾是歌德当年的普罗米修斯神话研究的诸神价值，现在又在浪漫主义中大放异彩。后泰坦形象既混合了观念论的天才的创造性，又禀有浪漫主义灵感的英雄色彩。相较于宙斯诸神形象，谢林的普罗米修斯已降格为浪漫主义英雄角色，其缘由在于浪漫主义的意识思维中混入了灵感。创造具有神圣价值，因为它宛如神之创世，灵感只能是一种特殊的禀赋能力。浪漫主义这种混合型的后泰坦意识表明，“普罗米修斯是一种思想——在这种思想之中，人类首先从自身之内创造出整个神圣世界，然后转向自身，产生自我意识，并意识到自己的独特使命”。^③

其次，我们再从谢林的普罗米修斯神话研究的辩证法语境来观察泰坦人性。意志（意欲）是谢林自由意志哲学最为基础的概念。“意欲就是原始存在（Ursein）”，^④而且他的“整个哲学所企求的，只是找到对原始存在的最高表达”。^⑤由此可见，谢林的泰坦人性指的是这种原始存在。经过谢林“意志的意志”这个自由辩证法神话研究，作为原始存在的意欲竟然化身为天赋理性，被普罗米修斯带到人间，于是，历史产生了一种新的普罗米修斯造物——市民阶级。因此，后泰坦人性与普罗米修斯造物（人性）显然又不是一回事。这岂不是说明世上有两种人性？在笔者看来，这两种人性对应于现实历史即是浪漫主义英雄和市民阶级，由于前者对后者明显怀有敌意，以致两者无论在逻辑还是历史方面都无法形成合题。谢林神话研究的误差准确反映了神话研究情境呈现出来的历史事实。

80

再次，我们从整体上综观这个由泰坦人性（意欲）、诸神价值（天才）和普罗米修斯造物（意欲的意欲）以及后泰坦英雄（天赋理性）构成的神话研究情境。三种人性和一种诸神价值如阿里阿德涅（Ariadne）纠缠在一起。泰坦时代通过“反神圣而成为神圣”的辩证法，把人性传给宙斯，让宙斯跟凡间女子结合生育赫尔克勒斯。宙斯眷顾他的新后裔，让他成为解放普罗米修斯的英雄。布鲁门贝格对谢林的神话研究的总结无疑是敏锐而深刻的，谢林的“意志的意志”后泰坦自然世界既包含普罗米修斯造物的人性，又包含宙斯后裔赫尔克勒斯英雄：“谢林不但将一种无意识的起源归之于希腊的诸神世界，而且还将它再次归之于同时代的‘观念论者’的‘自然世界’。”^⑥

从“认识论的最一般发展规律”来看，谢林的辩证法的泰坦人性反抗宙斯的诸神价值而使自身具有神圣价值，这说的是正即是反。但是，没有经过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合题的神话研究会不会产生另一种情况——反亦是正，希腊的诸神是否会被拉平为后泰坦人性，因而使浪漫主义英雄在后泰坦的自然世界产生强烈的不适感，正如现代文化中波西米亚和布尔乔亚一直存在不和与争执。历史的事实显然是，两种人性的对抗冲突和深深的敌意撕裂着反浪漫派的浪漫主义诗人海涅的心灵。

二、对海涅的辩证法神话反题研究

正如海涅于抒情诗巅峰之作《罗曼采罗》中所袒露的心迹：“天国的怀乡病侵袭了我，逼

① Hans Blumenberg, *Arbeit am Mytho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1, S 628.

② Hans Blumenberg, *Arbeit am Mytho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1, S 632.

③ Hans Blumenberg, *Arbeit am Mytho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1, S 632.

④ 《对人类自由的本质及其相关对象的哲学研究》，第63页。

⑤ 《对人类自由的本质及其相关对象的哲学研究》，第63页。

⑥ Hans Blumenberg, *Arbeit am Mytho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1, S 632.

得我奔过森林山谷，奔过辩证法的眩人的山径。”^① 他的普罗米修斯神话研究同样染上了辩证法的色彩，主要通过反转（Umkehrung）和反讽（Ironie）等文学的技巧形式，从精神文化方面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辩证法的否定性。

普罗米修斯的盗火之举本是对诸神意志和神圣的反抗，启蒙运动却将其挪用为人类谋求光明的历史使命，这为启蒙流产种下祸根，作为光明使者的普罗米修斯却因此成为伟大的受难者。这个普罗米修斯的核心形象现今被投射于法国革命的继承人拿破仑身上。当流放于大西洋孤岛岩石上的拿破仑与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终于叠合在一起时，歌德捕捉到启蒙顶峰时期普罗米修斯与拿破仑形象互换、共同书写反抗父亲的审美自由故事，现在终于被海涅以另一种神话研究方式进行书写：“普罗米修斯成功地第一支光明的火炬扔向黑暗的中世纪，……铸造为崭新的人性。”^② 海涅、拿破仑和普罗米修斯交织而成的三角参照关系的神话研究依然是一个神话，因为“崭新的人性”终结了中世纪流传下来的“旧人性”：“自由思想和新教教会的所有朋友，不论怀疑派或正统派，都同时奋起反对天主教复辟主义者。”^③

海涅的普罗米修斯神话研究把经验现实和神话形象的改造交织起来，对歌德的神话研究程序有意反转而进行创造。歌德神话研究的思想轨迹从普罗米修斯到拿破仑，最终落在普罗米修斯身上。海涅则从拿破仑出发，联想到普罗米修斯，最后回到拿破仑。前者是对审美创造自由的一种反思，后者则无疑指出这样的历史事实，海涅像普罗米修斯或拿破仑一样承受起自由叛变之后的痛苦。笔者认为，正是前者引发了后者的痛苦，其缘由是，审美的自由创造所带来的“彻头彻尾的独一无二自然个体之神”（die Einzigkeit einer solchen Natur-jeder zoll ein Gott!）价值，^④ 最后变成了一片狼藉的个体性“政治现实”。

观念论者和浪漫主义者大多把拿破仑当作革命偶像进行崇拜，因为拿破仑的言行既符合观念论的天才形象，又能扮演浪漫主义的英雄角色。毋庸置疑，拿破仑的政治功业与浪漫主

义的审美创造虽各有千秋，但都共同聚焦于个体性的创造。这种个体性创造接管了谢林自由意志的普罗米修斯造物人性，进而“关心市民自由的利益”。^⑤ 在《浪漫派》中，海涅把这个普罗米修斯形象赋予一位“在法国无人知晓”而在“德国文学界最伟大的公民”^⑥：“福斯用诚挚的、有时甚至用低地德语歌颂易北河下游的小市民生活。他根本不把中世纪骑士和圣母作为自己作品的主人公，而是把简朴的新教牧师及其富有美德的家庭选为自己作品的主角。在新式抒情诗人患了那么重的梦游病，那么热衷于骑士风度，那么矫揉造作时，福斯却是那么身心健康，那么富有市民风度，那么朴实无华。”^⑦ 福斯创作中的新教市民美德与浪漫派的骑士风度构成了鲜明的对比。更有甚者，福斯作为反浪漫派的代表与浪漫派展开了古典作品和莎士比亚作品翻译领域的竞争。这两个事件无不表明市民政治领域的个体性创造与审美领域的个体性创造出现了巨大分野。由于“独一无二自然个体之神”的分裂本性使然，市民的个体性政治现实使大众以诸神方式行事时，令神性本身因内在纷争而迅速走向衰败。这是启蒙流产最为隐秘的原因，也是海涅普罗米修斯神话研究的第一度反转。有必要重申，市民的个体价值观念和权利思想是从谢林等浪漫主义个体的天赋理性那里获取的。换言之，在天赋理性的意志伸张中，浪漫主义个体创造能力既为广大群众带来个体尊严，又馈赠给市民社会以个体权利思想。上文谈过，普罗米修斯以个体性创造价值反抗宙斯的诸神价值时使自身成为浪漫主义英雄角色，反神圣亦是神圣的；普

① [德] 海涅：《罗曼采罗》，钱春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363页。

② Hans Blumenberg, *Arbeit am Mytho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1, S. 646-647.

③ [德] 亨利希·海涅：《浪漫派》，薛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3页。

④ Hans Blumenberg, *Arbeit am Mytho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1, S. 645.

⑤ 《浪漫派》，第44页。

⑥ 《浪漫派》，第44页。

⑦ 《浪漫派》，第45页。

罗米修斯的反抗亦不排除“反神性亦是人性”的局面：当普罗米修斯以泰坦人性（原始的意欲）反抗宙斯的诸神价值时，很有可能使宙斯的诸神价值降格为福斯这样的反浪漫主义英雄。这种糟糕的结果带来海涅普罗米修斯神话研究的第二度反转：昔日作为恩人的浪漫主义如今却成为市民美德的仇敌，并在海涅的政治遭遇中拉开序幕。

海涅普罗米修斯神话研究的第一度反转为第二度反转埋下苦果，这在“市民国王”路易·菲利普相关的政治体制中体现出来：市民政治颠覆了行为端正、品格庄严的贵族政治。人性堕落的市民教养如“头顶着地的普罗米修斯”登上历史舞台，^①最为典型的国家就是充斥着“士兵和市民”的“小人物”普鲁士。海涅在睡梦中无意识地扮演起被小人物包围的普罗米修斯角色，作为启蒙者海涅反被众多普鲁士鹰爪“啄食心肝”，这可是当年海涅启蒙过的被启蒙者。诗人海涅以论辩讽刺（polemischsatirische）手法，^②充分利用普罗米修斯神话研究材料，重构这位德国普罗米修斯所亲证的历史恐怖情景：由先前的宗教专制主义摇身一变成为当时的政治专制主义。在海涅《北海组诗》第二组《海洋女神之歌》中，这种“完全缺乏自由状态”的普罗米修斯痛苦便有了悲剧背景式的描述和刻画。最后在《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中，海涅继续在梦中流露出一种“深刻的世界痛苦”^③：他一改造人陶工的诗人形象，终成为普鲁士鹰爪之下受难的普罗米修斯。

海涅的痛苦究竟从何而来？布鲁门贝格把海涅的普罗米修斯神话创作置于启蒙效果的历史背景中，又一次彰显出启蒙的难题。无论从抒情诗还是游记来看，海涅以田园诗风格将自己塑造为痛苦的光明使者，但是，事情的吊诡之处也在这里：“寥寥无几的启蒙满足感无情地击倒了他。”^④对于启蒙者反被被启蒙者所伤的难题，布鲁门贝格以摇曳生姿的雅驯文字掩盖了明确的答案仅略加陈说。普罗米修斯的盗窃行径现被启蒙者误用为启蒙光明使者的神话而牵出一桩案件：启蒙之光的隐喻掩盖了理性之火的现实危险。启蒙本是传播诸神的独立的个

体价值，但是个体价值的流布和深入人心并没有使大地到处充满诸神，理性反而成为个体谋求一己私利的工具。启蒙理性就如西谚所说，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原因何在？一方面，在理性没有使“人人为尧舜”的情况下，它倒是启发了千千万万利己主义的“小人物”市民阶层。另一方面，理性本身的诸神之争所形成的分裂局面，使人们对理性的选择不仅充满困惑，而且还披上了怀疑意识。早在启蒙运动之前，人们认为理性的地位至高无上，就像宙斯一样毋庸置疑。经启蒙之后，人们如康德一般大胆运用理性，转而对启蒙的光明使者普罗米修斯的诸神形象投之怀疑目光，由理性派生出来的怀疑意识就像那众多兀鹰啄食普罗米修斯的心肝。

从“精神文化的最一般的发展规律”来看，启蒙最大的困境即在于，由诸神理性启发出来的市民理性反过来成为啄食浪漫主义英雄的兀鹰。这是海涅普罗米修斯神话研究的第二度反转。因此，理性的启蒙并没有改善个体的苦难：“个体的苦难是其（启蒙）失败的祭品。”^⑤这种个体所面临的苦难失势（Ohnmacht）是对启蒙的自我授权（Selbstermächtigung）的最大反讽。^⑥启蒙之后，人类重获这样一种个体观念，它带给人类的总体命运正如海涅所说：“大地，是一块巨大岩石，人类就是真正的普罗米修斯，被禁锢在岩石上，任霹雳神鹰（怀疑精神）将他撕成碎片——他盗取光明，而惨遭折磨……”^⑦在辩证法的反题研究情境中，海涅的普

① Hans Blumenberg, *Arbeit am Mytho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1, S 647.

② Hans Blumenberg, *Arbeit am Mytho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1, S 649.

③ Hans Blumenberg, *Arbeit am Mytho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1, S 653.

④ Hans Blumenberg, *Arbeit am Mytho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1, S 654.

⑤ Hans Blumenberg, *Arbeit am Mytho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1, S 654.

⑥ Hans Blumenberg, *Arbeit am Mytho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1, S 654.

⑦ Hans Blumenberg, *Arbeit am Mytho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1, S 654.

罗米修斯必然承受着受难者的痛苦。究其根本原因，海涅忽略了古老的神义论问题。“反讽本身的结构是辩证的。它体现了诸过程范畴的本质。受到客观性的压迫，本质的主体会努力消灭既定的现实，然后在高级层面上重新创造现实。反讽从根本上反转了辩证之中的二元对立，解放了它，让它变成高级统一。”^① 海涅的辩证法的反题研究没有经过对立统一的扬弃过程，“变成高级统一”，从而失去执行一种历史的目的论机会。而这种目的论与古老的神义论问题相关，而海涅“轻佻哼着歌曲从古老的神义论问题（am alten Problem der Rechtfertigung Gottes）旁边走过”。^②

三、对马克思的需要辩证法神话研究

据说谢林的神话哲学是借鉴了新约教义，他阐发的观念论是为后基督教时代所作，是为后泰坦时代所写。他的普罗米修斯神话研究的“自然世界”又为我们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改写，成为后出转精的普罗米修斯神话研究。那么，在后泰坦时代里，马克思从“物质现实的最一般的发展规律”角度，又把观念论“自然世界”的“意志的意志”带向何方？

马克思博士论文《序》中最后陈述“哲学的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③ 表达了对普罗米修斯的顶礼膜拜。殉道者普罗米修斯谋逆对手诸神之父宙斯，会令我们联想到黑格尔。但是马克思的定语“哲学日历”提示我们，这场叛逆与哲学的革命有关。更确切地说，这是哲学编年史的革命。西方哲学史“始于阿那哥萨戈拉中经智术师到苏格拉底，再从苏格拉底开始中经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最后，整个哲学发展又还原为黑格尔化的框架”。^④ 西方哲学史上挤满了诸神形象——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而抹去伊壁鸠鲁、廊下派以及怀疑论哲学，无疑激怒了马克思的民主革命斗争精神。哲学的革命已不是叛逆一词所能形容的，它应该由辩证法的斗争关系予以解释。马克思的哲学自我剖白：“反对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是最高神性的

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⑤ 马克思的反抗不是徒逞匹夫之勇，还有哲学上的论据。伊壁鸠鲁为他树立了榜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哲学史上双峰并峙，已经成为不可超越的经典，哲学已终结了。伊壁鸠鲁却在二位先贤的哲学终结之后，重构了一种新的历史视野：伊壁鸠鲁自创“悠闲自在的无忧无虑的诸神”的幸福学说，第一次使亚里士多德的“不动的动者”获得生命的形式。伊壁鸠鲁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发展可以对应至浪漫主义普罗米修斯神话研究的情境：后泰坦时代普罗米修斯通过反神圣亦是人性的方式，把人性传给宙斯，宙斯由此眷顾他的新后裔，也就是说，普罗米修斯使宙斯的神恩现实化了。这启发了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哲学使命。

“哲学是作为一个历史活动的主体人格化”是伊壁鸠鲁最为大胆的思想行动。^⑥ 泰坦世界传至普罗米修斯后裔的人性是海涅笔下的市民阶级的个体性和独立性。马克思重新把失去生产资料的市民们集结成作为集体历史活动的无产阶级，将人性上升为神性，因为“马克思把神性等同于集体性”。^⑦ 这个哲学主体以泰坦革命精神、辩证法的斗争精神，成功地反转古典哲学史。前贤的榜样激励马克思在黑格尔之后为哲学重起炉灶，他依然面对着伊壁鸠鲁神话研究的情境：诸神统治了世界，时间已经圆满，历史近于终结。马克思运用辩证法的神话研究，在一个已经被占有和瓜分完毕的哲学史上，让

① [美] 维塞尔：《普罗米修斯的束缚——马克思科学思想的神话结构》，李昀、万益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54 页。

② Hans Blumenberg, *Arbeit am Mytho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1, S 654.

③ 马克思：《马克思博士论文：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一般的批判》，贺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1 页。

④ Hans Blumenberg, *Arbeit am Mytho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1, S 635.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2 页。

⑥ Hans Blumenberg, *Arbeit am Mytho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1, S 637.

⑦ 《普罗米修斯的束缚——马克思科学思想的神话结构》，第 205 页。

泰坦英雄的革命精神照耀后世。

马克思的后泰坦事业承继于精神之父黑格尔。黑格尔的柏林《宗教哲学讲演录》提及这位泰坦神祇，他是一种“自然力量”、一位“人类的保护者”，^①他“担保人类生命如同泰坦担保哲学”。^②由此得知，泰坦时代的自然力量事关物质现实的生命意识。但这种生命意识又不是“延续人类赤裸生命的基本要求的体现者”。^③相对于自我保存、权力和自我肯定的基本生命意识而言，谢林的自由意志仅是“意欲”，是上述生命意识派生出来的第二手材料。那么，后泰坦时代的自然力量又具有何种程度的物质现实？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自然力量不是最基本的生命意识。

普罗米修斯点燃天火之后，带来了事物的精制、洞穴的照明和铁器的使用，人类大踏步进入物质文明增长的阶段。这引起卢梭的惊呼：人类挣脱最低限度自我保存的束缚之后，其全部生产活动带来的结果是生命的羸弱；呵护羸弱又会产生新的羸弱。文明在卢梭眼里是一种腐败的生活。生产活动的生产同时增进生产关系的生产，以前是人身依附，现在不仅是对产品管理者的依附，而且还是对商品的依附、是人对物的依附关系。这种新型的依附关系源自于文明进程中的“匮乏”与人的需求增长之间的不对称关系。作为物质现实的生命意识，需求催生出来的不对称关系来自于人本身的恶意开启之门：“一个人的需要恰恰就是另一个人对他实施权力的作用点。”^④在布鲁门贝格看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描述的所有制起源和过剩需要所赖以产生的原因是，“每一个人寻思在另一个人身上创造新的需要，驱使他寻找新的牺牲品，将其推入新的依附关系，诱惑他追寻新的满足方式，从而导致经济的崩溃。为了在他身上满足自私的需要，每一个人努力把一种异化的权力建立在他人身上”。^⑤需要为什么会受到恶意利用？为何出现它与异化的权力共舞的局面？原因有二：第一，需要与用来满足需要的手段彼此分离。按照科耶夫对欲望的诊断，“人之欲望必须指向他人的欲望”。^⑥需要这种异化的欲望导致“每一个人都变成每一个

他人的潜在暴君”。^⑦第二，在物质现实层面，文明人对火作为技术的需要比不上初民对于火种的生存需要的程度。技术文明的需要导致人与人的彼此依附，所以是一种易于发生异化的欲望。比如说，人对空气的需要不会导致人与人的彼此依附，火的需要有可能导致占有者使用权力来扭曲未占有者的需要。因此，后泰坦世界对火的需要并不是泰坦世界最基本的生命意识，这种自然力量容易发生人为异化的危险。

后泰坦时代人的需要之异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生产关系的异化，促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物质现实的最一般的发展规律”，即资本对劳动力的需要以及劳动力对资本的依附关系的著名论断——“资本积累的绝对普遍规律”。这又使我们联想起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形象：普罗米修斯“成为无产阶级的原型，被自然规律禁锢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荒凉岩石上”。^⑧据布鲁门贝格考证，除博士论文外，马克思还有两次运用普罗米修斯神话形象，再加上他长年忍受肝痛的折磨，这些神话事件叠加在一起，使马克思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活动恍然间成为普罗米修斯神话研究的情境。这又与维塞尔的理论研究殊途同归：“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其实受益于一种诗性理想，一种诗性灵感，这就是视人类历史为人类解放的戏剧的需求。”^⑨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劳动力再生

① Hans Blumenberg, *Arbeit am Mytho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1, S. 638.

② Hans Blumenberg, *Arbeit am Mytho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1, S. 638.

③ Hans Blumenberg, *Arbeit am Mytho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1, S. 638.

④ Hans Blumenberg, *Arbeit am Mytho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1, S. 639.

⑤ Hans Blumenberg, *Arbeit am Mytho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1, S. 639.

⑥ Alexander Kojève,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5.

⑦ Hans Blumenberg, *Arbeit am Mytho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1, S. 640.

⑧ Hans Blumenberg, *Arbeit am Mytho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1, S. 641.

⑨ 《普罗米修斯的束缚——马克思科学思想的神话结构》，第66页。

产是资本再生产的本质要素之一。劳动力的经济学计算单位是劳动人口，如果没有被资本完全吸纳，就会形成相对的人口过剩。这完全取决于资本的内在增值需要，因为资本要靠储存劳动力来调节劳动力价格。资本主义的积累形成了“绝对普遍规律”，不论压迫者还是被压迫者都要服从它。这条新规律看起来像自然规律，其实还是历史规律，因为规律的决定因素落实在经济驱动的历史力量——人的需要上。就此而言，资本的增值取决于劳动力的需要水平，而不是相反。出于资本的增值扩张力量和劳动力对资本的依附，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关系“将劳动力牢固地钉在资本上”。因此，“资本主义积累”的理论构建活动就像普罗米修斯故事的基本轮廓，呈现在该神话研究的基本情境当中。无产阶级乃至整个人类被“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规律”束缚在“面目全无且阴沉灰暗的现实”上。

从“物质现实的最一般的发展规律”看，布鲁门贝格忧郁的看法没有感染我们。首先，这种由火的文明带来的需要不是最基本的生命意识，由此而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历史性的，最终如马克思所言是可以被神圣的无产阶级打碎的。其次，无产阶级已经在历史的辩

证发展史中，扬弃了资产阶级的个体自立性诸神价值，发展出一种由劳动所形成的新的神性——集体性，足可担负起新的拯救者赫拉克勒斯的历史使命。

布鲁门贝格和维塞尔关于马克思的科学思想虽然分享了普罗米修斯神话研究的共同旨趣，但研究的重心却落实于不同的层面。前者认为需要作为被承认的欲望，是对价值和意义的追求，也是对自我意识的发现。后者认为“劳动就是普罗米修斯带给人类的火种”，“劳动是社会主体积极的灵魂”。^①我们只有将布鲁门贝格对需要的价值和意义的追求与维塞尔作为社会主体灵魂的劳动辩证结合起来，经由劳动中介扬弃需要的异化权力，才能用普罗米修斯的辩证法火种照亮我们共产主义伟大壮丽事业的发展道路。

本文作者：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左杨

^① 《普罗米修斯的束缚——马克思科学思想的神话结构》，第236页。

Dialectic Studies of the Prometheus Myth

Li Baojing

Abstract: The self-understanding of nineteenth century western spirit is mainly based on the heroic image of the Titan Prometheus. This essay generalizes a dialectic research approach from the mythological studies of the Prometheus Myth by Schelling, Heine and Karl Marx respectively. Schelling's dialectics of "the anti-holy becoming holy" leads to the binary schizophrenia between Prometheus' creation of the individual citizen and Heracles' aesthetically creative genius. Through the poetics of irony—the antithesis research of dialectics, Heine revealed the internal causes to the failure of the enlightenment: as an individual aesthetical creator, the enlightener is injured by the individual citizen who is enlightened. Blumenberg examined Karl Marx's dialectics of "capitalist needs", and revealed the truth that the accumulation pattern of capitalism oppressed human nature. Therefore, we should develop the theory of collective divine value by way of labor, and criticize and sublimate the theories of private capital.

Keywords: Prometheus myth; Blumenberg; dialectics; mythological studies